

新中国 新闻传播60年长编

1949—2009

上

XINZHONGGUO XINWEN CHUANBO
LIUSHINIAN CHANGBIAN

刘家林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新闻传播 60 年长编 (1949—2009) (上) / 刘家林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81135 - 682 - 3

I. ①新… II. ①刘… III. ①新闻事业—概况—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39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铨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7

字 数: 1212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上下册总定价: 198.00 元 (精装)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传播业	
(1948 年—1957 年 4 月)	4
概 论	4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新闻政策及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	6
第二节 新中国新闻传播业网络的初步形成	18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传播业的管理与经营	52
第四节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及中期新闻宣传报道的内容分析	61
第五节 1956 年前后新闻界的改革与新闻学研究	78
第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事业	
(1957 年 5 月—1966 年 4 月)	148
概 论	148
第一节 “鸣放”及“反右”斗争中的新闻界	151
第二节 “大跃进”运动中的新闻宣传与新闻界的“大跃进”	176
第三节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新闻传播业的调整和发展	191
第四节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新闻报道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收获与成就	215
第五节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新闻报道及宣传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258
第三章 “十年‘文革’”中的新闻传播业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	274
概 论	274
第一节 “文革”前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1966 年 5 月—1969 年 3 月)	278
第二节 “文革”中期的新闻传播运动	
(1969 年 4 月—1973 年)	326
第三节 “文革”后期的新闻传播业	
(1973 年—1976 年 10 月)	346

绪 论

时光荏苒，岁月峥嵘，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已走过了60年的历程。把这60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体认和评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①；这是一个腾飞、崛起、创造奇迹的年代，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希望和拥有远大前程、美好未来的年代。回首60年的历程，我们会打心坎里感到新中国新闻传播业已经发生了非常广泛、深刻的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更加广泛、深刻的变化。反思60年的历程，我们会看到我国的新闻传播业走过了多么曲折、艰辛的路程，留下了深深的足印，斑斑可考。60年里，无论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培养形成的宝贵传统，还是失误、灾难、沉痛的教训，以及蹒跚而行的弯路，且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到今天，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回馈和补偿给我们的一笔无比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60年过去了，我们无怨无悔，我们庆幸我们是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者和新闻传播学人，我们经历了多么丰富、曲折和色彩斑斓的人生。60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更加成熟、理性和自信，更加充满朝气、活力与创新精神。让我们以博大的胸襟、全球化的视野，反思、审视新中国新闻传播业60年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和智慧，探索新闻传播业在今后少走弯路、健康发展的规律。面对新世纪，开创新未来。基于以上理念，著者不揣鄙陋，不自量力，单枪匹马，积十年之功，奋力拼搏，撰著这部《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

开宗明义，谨将写作宗旨、遵循原则及体例发凡、框架结构揭橥、臚列如下，聊供阅者垂察。

一、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力求开拓与创新，力求对旧的框架和研究范式有所突破，不断拓展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间和领域

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新闻传播业发展史、新闻体制及制度发展史、新闻传播思想及观念史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而限于单一的新闻业史（主要是报业史）研究。另外，摒弃偏见，与时并进，对新媒体发展史的追踪研究，也是拙著一大亮点。

早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



闯将。”^②邓小平这段论“思考”、“探索”、“创新”的名言，著者奉之为圭臬，并贯穿于整个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

二、矢志不渝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来审视历史

60 年来，新闻传播业界、学界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但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成绩是主要的。一方面要防止盲目肯定一切的态度，另一方面要防止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抬头，尤其要反对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所谓“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极右思潮。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多一些冷静的、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尽量少一些片面性、绝对化和情绪化的宣泄，尤其重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模式的研究。

三、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说套话

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上史家“书法不隐”的“实录”精神；“董狐直笔”，不虚美，不隐恶，美恶不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不“曲学以阿世”。^③

四、打牢基础，资料工作最重要

广泛、全面地搜集资料，尤其是重视大量占有第一手原始材料，防止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这是能否写出一部真实、客观、全面、翔实的当代新闻传播史的关键所在。论从史出，让事实说话，让材料说话；从材料中总结规律，从材料中提炼精华。明、清之际大学问家顾炎武云：做学问、写文章、写书要“采铜于山”，即从矿山开采原始的铜矿石，经过洪炉鼓铸、提炼，才能炼出精铜来。如果把古旧的铜钱打碎来炼铜，这样不仅炼不出好铜，甚至连古人的传世之宝也毁了。也即是说：写文章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是东抄西抄，东拼西凑，改头换面，这样写不出好文章，也毁了人家的著作。总之，要酿花成蜜，不可毁钱为铜（“懔毁钱为铜之戒，竭酿花为蜜之能”）^④。现代著名史家陈垣云：史家搜集资料要全面、广泛、深入，要“竭泽而渔”。傅斯年亦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以上三位学人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故著者在材料搜集方面下力尤深。

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⑤是本书一大特色

大凡每一项新闻传播业务的改进与创新，每一种新闻传播观点、学说的提出，每一体制、制度及团体、组织、机构的沿革，著者都将下一番考据工夫，对其来龙去脉和影响所及，尽可能精详，使人“由委溯源”。

六、“专题研究”及“案例研究”为拙著又一特色

“专题研究”具有“专”、“深”的特点，故有助于学术研究；“案例研究”实用性



强,故有利于教学工作。另外,拙著尤为重视全面、系统地反映60年来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变化的面貌。

七、关于断代、分期与时段划分

分期及时段的划分,既要考虑新闻传播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又要考虑新闻传播业在各个历史阶段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际大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分期新中国新闻传播史时,必须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考量。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良史须兼“才”、“学”、“识”三长,而尤重“史识”。^⑥“学”者,指占有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有丰厚的史料积累和储备,所谓“史料精熟”也;“识”者,有眼光,有见地,看得深,看得远,看得透,所谓“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优美,表述生动畅达,所谓“文笔精妙”也。^⑦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也标榜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重,三者相济,完美结合,不可偏废,“依义理以求善,借考据以求真,托辞章以求美”^⑧。

以上是对史家、史著的最高要求,也是史家、史著的最高境界。著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为序。

注 释

①夏衍:《风雨故乡情——〈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载陈海云、司徒伟智著:《廖沫沙的风雨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③春秋战国之际晋国之良史董狐,“书法不隐”,秉笔直书,事见《左传·宣公二年》,详见《左传》《十三经注疏》本第1984页;齐国之太史兄弟以及南史氏,忠实记录历史事实,不惜以身相殉,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见《左传》《十三经注疏》本第1982页;《史记》一二一卷《轅固生传》:“(公孙弘)侧目而视固(轅固生),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④顾炎武《与人书》:“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鼓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见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

⑤章学诚《校讎通义·叙》:“叙曰: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见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版)

⑥《新唐书》第一三二卷《刘子玄传》:“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榘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

⑦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作者自序》:“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⑧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述庵文钞序》云:“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见“四部丛刊”本《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文集四》“序”)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传播业

(1948年—1957年4月)

概 论

对于这部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业史的起点，著者特将它定在1948年。

1948年5月间，中共中央从陕北延安迁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历时一年零两个月（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行程4000余华里。此后的10个月里，党中央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三大战役，规划创立新中国的蓝图，还在这里制定了有关新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前途的、带纲领性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在此期间，党中央的舆论宣传喉舌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也随中央迁到西柏坡。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办，毛泽东专门为它题写报头。

1948年秋冬之际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历时4个月零19天的“三大战役”战略决战。^①经过三大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

1949年3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陆续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抵达后驻北平香山一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②，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新闻传播业史的崭新篇章。

从1949年至1956年的7年时间，可分为两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即从1949年至1952年间，是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整治社会环境、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从1953年至1956年的4年间，是实行“三大改造”，即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7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新闻传播业有如下一些特点：

（1）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的转变，成为执政党，掌握了各种资源。党的办报活动，由早期的非法办报变为合法办报，由早期的地下办报变成了公开办报，由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在山沟沟、在农村办报，变成了在大城市办报，从此开始不断探索在城市办报的路子和经验。



(2) 在短短的几年间,新中国新闻传播业网络基本形成。这个网络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它主要包括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为主的新闻通讯网,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包括各省、市台的广播网,以人民日报为龙头,包括各省、市党委机关报的党报网。从此,党报取得了在新闻传播业界的统治地位及垄断、独占地位。

(3) 1949年以后不久,私营、民营报刊电台在中国内地消亡,退出了历史舞台。个人办报、同仁办报成为历史陈迹。

(4) 由于缺少办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经验,从1953年起,我国新闻界掀起了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热潮。这其中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5) 1956年4、5月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大好形势下,为准备“八大”的召开,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全面论述“十大问题”(“十大关系”),总结我国的经验,反思苏联的教训,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向科学文化界详细阐述了党的这条方针。刘少奇也在这一年5、6月间,跟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同志谈话三次。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日报》及各省市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不久由于政治形势的大局发生变化,改革夭折。

这一时期,有关报刊业的历年统计数据如下[据大型文献性资料综合期刊《新华月报》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所载“全国报纸杂志初步调查表”统计]:1949年初,全国有报纸263种,其中华北区41种、东北区47种、西北区13种、华中区30种、华东区64种、琼崖区5种、部队报纸63种;全国有杂志164种,其中华北区21种、东北区18种、西北区10种、华中区52种、华东区63种。^③另据陆定一、邓拓记载,1950年,我国报纸种数为382种。^④1951年有报纸477种,发行总数532万份,其中,“地区:中南一一二种,华东一一〇,华北九一,东北六二,西北四九,西南四九,内蒙四。类别:普通一五〇,工人一三一,农民三三,青少年三四,兄弟民族文字一七,外文一〇,学生五八,其他四四。发行迅增:去年(1950年——引者注)一月全国三二〇种,二六一万份。年底,三八二——三六五万”;“上半年五十家已有三十四家盈余,《新疆日报》八月份余银元十二万三千余;内蒙古,少亏。加强管理,减低成本,改善设备,提高质量,主要加强内容”;“《人民日报》发行三十一万八千份”。^⑤

1952年全国报纸减少为271种,主要原因是“一九五〇年有三百八十二种。一九五二年整顿了一次,因为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了很多报纸,有的一个县就有几种,经过整顿,减少了很多,还剩下二百七十一一种,减少了一百一十一一种。一九五三年又经过一次整顿,那时中央宣传部曾发过一个取消一些地方报纸的指示(实行调整和计划发行——引者注),以后就减到了二百五十八种。现在(1954年——引者注)报纸的种数还是一九五三年的数字,没有增加”^⑥。

1954年的258种都是全国专区以上的报纸,“每期发行总量为八百万份”,“在这些报纸中,党的机关报有一百五十一一种,工会的报纸有十七种,农民报纸有二十三一种,青年和少年报纸有十七种,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的报纸有十五种,专业报纸有十四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有二十一种,俄语报纸有两种”^⑦。

1955年285种,每期平均印数1051万份;1956年347种,每期平均印数1333.8万份。^⑧

期刊方面:1949年,全国杂志257种,每期总印数2000万册;1950年295种,



每期总印数 3 500 万册；1951 年 302 种，每期总印数 1.77 亿册；1952 年 354 种，每期总印数 2.04 亿册；1953 年 295 种，每期总印数 1.72 亿册；1954 年 304 种，每期总印数 2.05 亿册；1955 年 370 种，每期总印数 2.88 亿册；1956 年 484 种，每期总印数 3.53 亿册。^⑨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新闻政策及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

一、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

1947 年底，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序幕。到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地区的许多重要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到 1949 年底，全国解放的大中城市有 60 多个，其中在三大战役前后解放的著名大中城市有石家庄（1947 年 11 月 12 日解放）、洛阳（1948 年 4 月 5 日解放）、济南（1948 年 9 月 24 日解放）、长春（1948 年 10 月 19 日解放）、沈阳（1948 年 11 月 2 日解放）、张家口（1948 年 12 月 23 日解放）、天津（1949 年 1 月 15 日解放）、北平（1949 年 1 月 31 日解放）、南京（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杭州（1949 年 5 月 3 日解放）、武汉（1949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解放）、上海（1949 年 5 月 27 日解放）、广州（1949 年 10 月 14 日解放）、重庆（1949 年 11 月 30 日解放）、成都（1949 年 12 月 27 日解放）等，这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1948 年 11 月 2 日）、淮海战役已经打响（1948 年 11 月 6 日）后的 1948 年 11 月 8 日，中共中央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及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⑩这是中共中央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为新中国成立初如何处理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新闻事业而制定的一份系统、翔实、完备而又审慎的纲领性文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全面体现了党在当时的新闻政策，意义十分重大。

《处理办法》共六大条，概括起来可分为四个大的方面：

（一）对新解放城市旧有新闻事业的总体评估及基本方针、原则

《处理办法》一开始便对新解放区旧有新闻事业作了合乎当时实际的、中肯的总体评估：“我军现已解放许多大中城市，以后还要解放许多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其中有少数对国际宣传极有影响，并与外交有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以及外国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这些新闻宣传工具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处理办法》接着阐明了对城市旧有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



通讯社一般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应采取鼓励政策。而且因为中国所谓私营的新闻宣传事业，绝大部分有反动的政治背景，对这些所谓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如采取毫无限制的放任政策，会使某些反动的政治势力容易获得公开地、合法地联系与影响群众的阵地，则对人民极为不利。但旧有报刊中也有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的，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共产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这种原则为指导方针，党规定对反动的新闻事业实行查明实据之后加以没收的政策，对进步的新闻事业予以保护与扶持，对中间性的新闻事业允许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一切报刊、通讯社（包括党报和新华社），都应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

（二）对旧有报纸、刊物及通讯社的具体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对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之处理，规定为：“（甲）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乙）凡属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如其间发生重要问题，应请示中央处理。（丙）凡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之报纸、刊物及通讯社，应分三类处理：①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例如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及北平《益世报》等），应予没收。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②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贯保持进步态度，反对国民党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者，应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民主政府登记。③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不赞成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不拥护人民解放战争者）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新解放城市中所有继续出版与新创刊之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包括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之报纸、刊物、通讯社在内），应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其在本决定达到前，已行出版者，亦须补行登记。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在申请登记时，应一律报告其政治背景、经费来源，负责人姓名及其经营规模、发行数目、人员状况等。”“凡经政府登记许可出版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民主政府对于它们实行事后审查制度。”“各地党委对党外人员和团体发行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主动地设法提高其政治水平，加强对它们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但对党外报纸、刊物与通讯社，除开上述登记、事后审查及各项命令外，不得采取不适当的行政办法去实现这种领导”。

（三）对旧有新闻工作人员的态度及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规定：“（甲）对于已经登记许可之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的新闻工作人员，除已指名撤换的反动分子外，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乙）已被接收、没收及停刊之报纸、刊物、通讯社，对其工作人员之处理分别为：①反动者不用，其中特务分子应按一般特务分子处理。②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



子留用，一般应先任用于次要工作和内勤工作，根据进步程度，逐步提升。③一般的编辑与记者，其比较容易改造者，应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然亦不应轻易使其担任编辑与记者工作；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应听其或助其转业。④技术人员（例如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

（四）对外国通讯社、外国记者及外国人所出版报纸、刊物的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规定：“（甲）外国通讯社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发稿，并一律不得私设收发报台。（乙）外国记者停留解放区继续其记者业务者，应根据外交手续向人民政府请求许可，并不得私设收发报台，其发出之稿件，应受中央所指定之机关检查。（丙）外国人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出版报纸与刊物，原已出版者亦须报告中央处理。”^⑩

二、解放初对外国在华新闻业及机构采取的举措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颁布以后，很快就在全国刚刚解放的各大中城市贯彻实施。如在北平，从1949年2月下旬开始，停止有关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在华的新闻活动；7月间开始，正式取缔“美国新闻处”的在华活动。对外国私商主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则暂时准其继续出版。这些政策、规定的实施是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以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需要的，也是与党中央当时制定的大的外交政策相一致、相配套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制定了三大外交原则：①“一边倒”；②“另起炉灶”；③“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⑪后两者指不承认外国政府当时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对国民党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特权及影响逐步取消、肃清，然后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停止外国记者在华活动、取缔外国新闻机构等举措，也是当时“打扫干净屋子”、“清理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

【停止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在华的新闻活动】1949年1月间，华北最大的两座城市天津、北平相继解放。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即宣告成立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天津市政府，黄克诚任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平解放古都北平，叶剑英任北平市市长。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停止所有在北平的外国通讯社和外国记者的活动。《通令》原文云：“由于目前军事时期的情况，所有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均不得在本市进行活动，所有外侨均不得在本市办报纸和杂志。为此，本会特通告现在在北平的美国新闻处，自即日起停止发布新闻稿的活动；各外国通讯社及外国报纸杂志的记者，自即日起停止采访新闻及拍发新闻电报的活动。望即遵照毋违。”^⑫据新华社电讯报道，当时“在北平的外国记者有美国合众社的基昂（一作“季昂”——引者注），美国联合社的穆萨（一作“莫莎”——引者注），美国生活画报、时代杂志和自由周刊的步雅各，先驱论坛报的史蒂禄，天主教通讯社的霍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星报和英国伦敦每日



电讯报的卢百霜，美国纽约时报和北美报纸联盟的来琪瑛，美国民族周刊和加拿大明星周刊的罗德，荷兰路特报的罗德夫人，美国哈特福时报的哈丁，美国芝加哥报的鲍大可，英国甘史莱系报纸的温逊德，英国伦敦观察报的安伯生夫人，伦敦泰晤士报的路易逊，瑞士哈利克新报的鲍萨尔，瑞典斯托哥尔摩日报的倪斯初，法国新闻社的张麟申”，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美国合众社记者季昂，美联社记者莫莎等就曾站在反动的立场，从刚解放的北平发出严重歪曲事实、污蔑北平的报道。^⑭

当时的舆论对北平军管会及北平新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完全赞同和大力支持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允许外国通讯社，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的存在，是否“放任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自由采访，自由发稿，自由发报”，香港《华商报》在当时曾刊登过两篇重要文章进行讨论。一篇是1949年2月20日该报“星期增刊”《笔谈》专栏刊载的、署名“某内勤”写的《从北平美国记者的诬蔑想到将来的外国的通讯社》。文章先介绍：“美国合众社记者季昂和美联社记者莫莎，从解放后的北平发出污蔑北平——不，应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荒谬电讯。这事件已经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北平的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文艺作家、工人、职员、学生纷纷发表文章，要将这两个美帝国主义的造谣记者驱逐出境。”接着，作者写道：“我坚决主张，在新中国的新闻事业领域，绝对不容许蒋介石的殖民地政府一般的放任帝国主义思想侵略机关的外国通讯社继续存在。”“新闻是人民精神上思想上的每日的食粮”，“但这食粮必须有清洁、营养的质。新政府要有卫生机构来研究人民的食品，同样的新政府也有责任来管理人民的精神食粮，决不容许帝国主义者把毒药鸦片和春药偷偷地放进我们的精神食粮里去”。另一篇是1949年2月27日《华商报》“星期增刊”《笔谈》专栏刊载的署名“寒”写的《关于外国通讯社》，该文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一些外国通讯社与国民党“中央社”互相勾结，互相配合，反共反人民的手法和伎俩。文章云：

在过去几十年间，在目前的蒋管区内，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控制着中国的新闻事业。不但中国报纸的国际新闻完全依靠外国通讯社供给，就是国内新闻也大量采用外电。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宣传”，当然更非完全由外国通讯社一手包办不可。如果要办一种大型的日报，而不订购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抗战前后，以迄于今，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关“中央社”曾以高价收买了外国通讯社（主要是美国的合众社、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哈瓦斯社——战后改称法新社）的中文发稿权，以强化新闻统制。而在毒害中国人民、混淆国际视听这方面，自从作为帝国主义思想侵略机关的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关的“中央社”结合以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譬如说，外国电讯社有时反映了国际间对于中国问题的比较中立的看法，经过“中央社”的统制后，这些报导便成为“中央社”的“参考资料”（专供国民党军政长官参阅），永远不会再出现于报纸上和读者见面。又如外国通讯社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若干情况，有时为了营业观点也会透露一些比较真实的消息，但“中央社”的编辑部把这些消息吞下去了。恰恰相反，外国通讯社所有反苏反共，符合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利益的报道和看法，通过了“中央报”的发行网、通过了“中央社”的政治压力，可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每一家报纸的重要的国际新闻。同时，所有对于中国人民有害的东西，从恶意歪曲到造谣污蔑，从渲染“中国的铁托”到“北平狐皮事件”，从描写“苏北难民的口



述”到“北平市民欢迎征服者”，从暗示“中共的铁幕”到“东南亚的威胁”等，正是今天在华外国通讯社所不断制造和夸张的“动人的新闻”，这也正是“中央社”所要求的東西。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外国通讯社，尤其是美国通讯社和为四大家族利益服务的“中央社”，在“新闻政策”上，在反苏反共反民主的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彼此互相配合，互相结托，在最近两三年间，在美帝进行侵华政策和国民党进行反动内战的过程中，美国通讯社实在尽了很大的力量。

《华商报》的这两篇文章都坚决主张取缔在我国境内发稿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禁止其在华进行的不法新闻传播活动。

【取缔“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1934年3月，美国政府为了宣传联邦政府的活动，成立了美国新闻处。当时这个机构规模很小，隶属于总统下面的全国紧急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美国政府于1942年6月13日根据当时总统罗斯福所签署的法令，把这一机构改变成战时情报局所属的一个单位，使之成为一个对外宣传和搜集情报的机构。1945年“二战”结束后，战时情报局撤销，美国新闻处却继续存在。到1953年8月1日，美国新闻署成立。此后，凡美国在海外的一切宣传活动仍以“美国新闻处”名目出面，世界各地的美国新闻处往往成为美国驻当地大使馆或领事馆的一部分。

在直属总统领导的联邦一级机构中，美国新闻署是一个权威的、级别很高的机构，它在外交政策上受国务院领导，在其他方面与政府各部平行。新闻署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向总统报告工作。新闻署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到1957年，其全部工作人员达12 624人，其中8 285名为外国籍雇员，1 415名为派赴国外工作的美国人，2 924人则在华盛顿的新闻署总部工作。该署以“美国新闻处”名义在78个国家设立了206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和情报搜集工作。^⑮

美国新闻处最早在中国开展活动，大约在抗战开始后的1940年前后。当时在美国新闻上全称叫“战时美国新闻处”，其对外宣传的方式和开展的主要活动有发布新闻稿，办图书馆、阅览室，赠送报纸、杂志、书籍，放映电影，举行音乐会，举办艺术和工业展览，展出、张贴图片，等等。因此，有人称“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政府的“文化统战单位”、外宣喉舌，这些评价是很恰当的。1942年2月24日，“美国之音”——美国一家私营广播公司经营的广播电台在纽约开播，不久为美国国务院赏识而加以接管。此后，美国新闻处又通过“美国之音”进行广播宣传。

抗战时期，驻中国的美国新闻处分别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设立总处或分处。抗战胜利后，总处由重庆迁到上海，加上各地分处，共计有上海、重庆、北平、天津、成都、武汉、广州、昆明、沈阳、台湾十处，规模庞大。据当时美国合众社统计，到1948年，在中国各地的美国新闻处辖下的人员有2 800多人。

抗战时期，美国新闻处尚有些开明人士，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包括进步的学生运动，予以支持。而且他们《新闻资料》中所刊出的报道，正是缺乏新闻自由的国统区所难以见到的，故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那时美国新闻处的总处设在重庆，从属于美国驻华使馆及美军司令部，它除了经常刊出《新闻资料》外，还有不定时举办的图片展览。在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一个部门的美国新闻处，在罗斯福总统的开明政策下，刊发出来的报道及举办的活动还是比较倾向于民主的。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规模很大，曾聘用过不少进步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其中中文组组长是金仲华，还有刘尊棋、羊枣（杨潮）等（对他



们的聘请都是征求过当时中共党组织意见的)。新闻处的其他部门还有一些中国的进步知识青年在里面工作。抗战时期,美国新闻处有两大宣传任务:一是揭露敌人(德、日法西斯)的残暴;二是宣传盟国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鼓舞人民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随着杜鲁门的反动政策及美国蛮横的军人外交而来的,美国新闻处在战后是变了质的”。当时,较为开明的职员或负责人被调回去了,其立场随着美国国务院政策的改变而转移,报道内容是反共反苏的居多,对即将建立的人民政权采取仇视、诋毁的态度。有鉴于此,1949年7月,人民政府暨各地军管会,下令美国新闻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宣传机构,一律停止活动,并予以取缔。^④

三、新中国成立初对旧有新闻事业的处置办法与私营新闻业的最后消亡

【新中国成立初对旧有新闻事业的处置及几家著名大报的停刊】从1949年初到1949年底,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五大城市先后解放。与此同时,杭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也相继解放。各野战军部队进城后,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来处理旧有的新闻事业。对旧有新闻事业,主要包括报纸(刊物)、通讯社与广播电台,《处理办法》主要规定有三条:①“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报纸、刊物及通讯社,连同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②“凡属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③对私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之报纸、刊物及通讯社”,又分三类处理:①“有明显而确定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例如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及北平益世报等),应予没收”;②“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贯坚持进步态度,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者,应予以保护,并令其向民主政府依法登记”;③“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不赞成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不拥护人民解放战争者),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

除了报纸、刊物、通讯社外,旧有的新闻事业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广播电台。其中,国民党政府及党部所办的广播电台,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发射功率、影响力,在旧有广播电台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和绝对优势。因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11月20日专门就新解放城市中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处理,发出《对新解放城市中原有之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主要内容为:①各地要全部接收新解放城市中国国民党党、政、军所办的广播电台,并利用其设备建立人民广播电台;对原有的广播从业人员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录用、培训或遣散的方法处理。②对于民营广播电台,一律归军管会统一管理,并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凡是由国民党或其某一派系所经营,查明有据,专门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之宣传者,没收之;凡纯粹系私人经营者,则在军管会管理下,暂准其继续营业;外国资本或外国人经营之广播电台一律停止广播;私人经营之短波广播电台亦一律停止广播。③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

1949年1月至10月,天津、北平、南京、上海、广州五大城市相继解放。各大城市



都先后按以上所列中共中央《处理办法》来处理旧有新闻事业。

天津：在上述五大城市中，天津最早解放，因此，天津在处理原有的新闻事业上可借鉴的经验不多。解放军入城后，曾通知全市所有报纸一律停刊，9家广播电台全部停播。在停刊的报纸中，首先接管并没收财产的有民国日报社（国民党机关报）、新时报社（国民党军队九十四军军部机关报）、工商日报社（国民党天津市委托苑宝璜军所办）、中华日报社（中统在津机关报）、工人日报社（国民党政府社会部所办）。稍后没收的是在我国北方有广泛影响的大报《益世报》。《益世报》于1915年10月1日（旧历乙卯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天津创刊，是民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在天津出版的中文日报。该报由罗马教廷指派的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比利时人，后加入中国籍）主持，并任董事长，刘浚卿任社长。初创时，该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五四”前后，一度同情学生运动，曾聘周恩来为驻欧特派通讯员，撰写数十篇《旅欧通信》。“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钱端升被聘为社论主撰，强烈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7月天津沦陷，9月被迫停刊。1938年12月间，《益世报》由罗马教廷指派的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在昆明复刊。1940年3月迁重庆出版，同年6月雷鸣远去世，于斌任该报董事长。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迁回天津复刊，刘豁轩任社长、王研石任总编辑。此阶段该报极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益世报》曾先后出版北平版、西安版、上海版、南京版四大分版，是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之一，有人将其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1949年1月13日，该报出至第10845号后，被令停刊。^⑦

除以上报纸外，另有12家中文报纸也被通知停刊。其中有反动政治背景的6家：《真善美》、《中庸报》、《时事日报》、《中南日报》、《商务日报》、《大众晚报》。由私人经营，无显著政治背景的4家：《新生晚报》、《自由晚报》、《博陵日报》、《天津夜报》。还有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经常刊载批评、揭露国民党统治文字的《大公报》也被通知停刊。《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天津创刊，至1949年1月15日出至第16246号后被令停刊。此外，还有三家外文报《华北汉英报》、《俄文日报》、《英晚报》也被通知停刊。

中共中央对天津市军管会将所有报纸一律停刊的做法特发出电报，提出了批评：“中央并未规定一切报纸一律停刊”，“你们命令一切报纸一律停刊的方法不合中央去年（1948年——引者注）11月8日的指示”。同时，指示他们：“应按报纸性质属于进步、中间、反动等类采取分别对待办法。”特别是对天津《大公报》，中央在1949年1月18日的电报中指出：“大公报拟从内部革命，加入外力，利用其原有财产班底发表宣言，改换名称，组成进步分子的报纸，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⑧

在中央指出问题后，天津市军管会作了纠正，暂时准许《新生晚报》（日报，4开4版）、《博陵日报》（日报，4开4版）、《华北汉英报》（日报，8开2版）、俄文《新语报》等几家私营报纸登记后，继续出版。《大公报》也在地下党组织徐盈、杨刚等的帮助下，策划改组。1949年2月27日起，天津版《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出版。这是解放区新创刊的第一张民营报纸，由孟秋江任党组书记兼经理、张琴南任总编辑、徐盈任主笔。1953年1月1日，由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为新的《大公报》，在天津出版，《进步日报》随之终刊。1956年10月1日，天津《大公报》迁北京出版。“文革”中的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公报》被迫改名《前进报》。直至1966年12



月28日被迫停刊。^⑨对于天津市军管会命令原有的广播电台全部停播的做法，中央基本予以认可。中共中央在1949年1月17日的电报中指出：“广播事业，原则上应归国营。目前大城市中私人经营的广播电台，虽可允其暂时营业，但必先查明其背景，以免为潜伏的敌人所利用，在调查期间，应停止其营业。天津各私营广播电台，闻均有特务机关的背景，望予缜密调查，在获得确实结果后，再考虑是否准予复业。”后来批准恢复广播的仅“中行广播电台”一家，该台属中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主要广播广告的商业电台（到1950年，因抵债需要而出售给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1948年底，北平市在临解放前夕，原有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发生急剧变化，有的停止活动，有的散摊后负责人逃跑了。据统计：1948年1月，北平市有大小报纸176家、通讯社65家；到年底，报纸锐减至26家、通讯社20家、广播电台仅9家。

1949年1月1日，人民解放军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良乡成立，叶剑英为主任。负责新闻接管工作的有当时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还有袁勃、马健民、李庄、李千峰等。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的当天，北平市军管会下属“文化接管委员会”随部队进城，立即接管了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北平广播电台，2月2日始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名称播音，同年12月5日，改称“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同一天，范长江等接管了北平王府井大街的国民党在北方的头号党报《华北日报》。其社长张明炜几天前已乘飞机逃离北平。《华北日报》社址遂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社址，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李庄等接管了在西长安街石碑胡同的原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的资产。当时，中央社北平分社社长是丁履进，也在几天前乘飞机逃离北平。中央社北平分社资产交给新华社总社，随即成立新华社北平分社。^⑩

到1949年3月间，军管会又接管和查封了一些属于国民党各派力量办的报纸和一些立场反动的报纸，如《导报》、《阵中日报》、《北平时报》、《中国时报》、《世界日报》、《新中国晚报》、《经世日报》等24家旧报。英文《时事日报》在2月初停办后亦被接管。此后一段时间，北平市尚在出版的报纸只有两家：一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该报于1949年3月25日迁到北平出版，8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一家是陈铭德、邓季惺办的《新民报》北平版，到1951年改为公私合营，1952年10月1日被改办为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

广播电台的接管方面，在1949年2月，北平市的军中之声、七十二电台、胜利、北辰、华声5家敌台均被接管。中国、民生、军友三家广播电台以私营商业广播电台名义，被允许继续短期播音。到10月25日，这三家私营电台亦被查封。

上海：上海是我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中心。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有大小报纸70多家，外埠报社办事处10多家、通讯社80多家、广播电台50多座、期刊数以百计。^⑪

在上海解放前夕，军管会属下“文教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就成立了。“文管会”主任由军管会主任陈毅兼任，副主任有钱俊瑞、夏衍、范长江、恽逸群等。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随部队进入市区的上海军管会下属“文管会”新闻出版部马上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中的有关原则、精神，对上海地区旧有新闻事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对国民党党、政、军、特、宪及各派系所创办的或控制的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一律没收、接管。报纸如《中央日报》（上海版）、《和平日报》、《东南日报》（上海版）、《前



线日报》、《时事新报》、《金融日报》、《自由论坛》等，通讯社如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广播电台如上海广播电台等，一律实行接管，或立即查封，没收其资产，归国家所有，其资产及设备用于开办人民的新闻事业。对青年党机关报《中华时报》也一并实行没收政策。

对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经营，而被国民党派系控制的新闻机构也采取停刊的措施，如对《申报》、《新闻报》的处理就是属于此种情况的典型案例。《申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该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 C. C. 派接管，于1945年11月22日复刊。1946年5月，国民党强行投资《申报》，加入所谓“官股”，事实上将《申报》攫为国民党的官报。1949年5月27日出至第25600号后被令停刊。5月28日，申报馆改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解放日报》。《新闻报》是影响仅次于《申报》的上海第二大报。该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抗战胜利后，同《申报》一样，也被国民党“劫收”，同样被国民党当局加入“官股”，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1949年5月，《新闻报》与《申报》同时停刊。同年6月29日，改组出版《新闻日报》，第一任社长金仲华，总编辑刘思慕。1960年5月31日出版最后一期后，《新闻日报》并入《解放日报》。有一部分人员分流，调入其他新闻单位，如当时调入《新民晚报》工作的就有《新闻日报》原编委冯英子等。

另外，对几家著名的进步私营报如《大公报》（上海版）、《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支持其继续出版。对英商办的英文报《字林西报》也允许其继续出版。《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是英商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由字林洋行出版。其1864年7月创刊，1951年3月31日自动停止出版。

上海在解放前夕，有广播电台45家，其中公营电台22家，都是由国民党党、政、军、宪、警、特机关所主办，私营电台23家。对国民党系统所办的原公营广播电台，一律令其停止播音，其财产予以没收。如5月27日，作为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旧“上海广播电台”被接收，其房屋设备用来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晚上就开始播音，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与评论。而对私营广播电台的财产，则像对待其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一样，予以保护，在审查登记后，仍准其继续播音。

南京：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准备南下工作的党内外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如范长江、石西民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把中共具有光荣历史的两张党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报名保留下来，分别放在上海和南京两大城市，并让范长江去上海筹建《解放日报》、石西民去南京筹办《新华日报》。27日起，石西民以军管会军代表身份负责接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在地下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协助下，接收工作顺利完成。在接收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基础上，1949年4月30日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石西民任首任社长；在接收中央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华社南京分社，石西民兼任社长；在接收中央广播电台的基础上，1949年5月1日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该台是当时全国功率最强大的人民无线广播电台，台长仍由石西民兼任。^②

《中央日报》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该报于1928年2月1日创刊于上海，1929年2月迁至南京出版。抗战初期的1937年12月13日，因南京沦陷而停刊。1938年3月在长沙复刊，同年9月1日迁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1日迁南